

#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一辑

主编 孙江 刘建辉



013027955

B3  
04  
V1

#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一辑

主编 孙江 刘建辉



北航

C1634859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B 3  
04  
V1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一辑/孙江,刘建辉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

ISBN 978-7-108-04411-2

I. ①亚… II. ①孙…②刘… III. ①思想史—亚洲—丛刊  
IV. ①B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0499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任心仪 路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18

字 数 279千字

定 价 49.00元

## 缘起与意旨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既有的现代知识体系受到质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与此同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概念史是反求诸己、推陈出新的必经之路。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十年前，本刊部分同仁即已涉足概念史研究，试图从东西比较的角度，考察西方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以及汉字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念的互动关系，由此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当初的设想是，从“影响20世纪东亚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入手，梳理概念的生成历史以及由此建构的知识体系，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石。但是，阴差阳错，力小而任重，此一计

划竟迟迟难以付诸实行。

十年后,缘起石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主办两次“东亚现代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国的学者围绕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辩论。本刊编委急切地认识到,要想推进概念史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努力。

本刊是通向概念史研究的一条小径,举凡讨论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分科、制度以及现代性的论文及评论,皆在刊登之列。通过出版本刊,我们希望达到如下目标:首先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

本刊将本着追求学术、献身学术的宗旨,为推动撰写“影响20世纪中国及东亚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做知识和人力准备,诚恳欢迎学界内外的朋友给予关心和支持。我们不敢自诩所刊之文篇篇珠玑,但脚踏实地、力戒虚言,将是本刊一以贯之的态度。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言语飞逝,文字常留)。

《亚洲概念史研究》编委会

## 序：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

□ 孙 江\*

如果打开汉语因特网,输入“概念”二字进行检索,一定会蹦出数以万计的关于“概念”的信息。“概念”一词如此普及,乃至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其在逻辑学中的含义,都以为对概念有了“概念”(理解)。如果继之输入“概念史”一词进行检索,则会发现“概念史”是近几年才比较多地被使用的词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著述之中:一类为《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所提倡的概念史,它强调德国概念史方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另一类是在翻译和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时,人们注意到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与德国的概念史方法相似。值得思考的是,与概念史一词相比,广为学者所使用的是“观念史”或“关键词”<sup>①</sup>,这可能与两本影响广泛的著作有关,一本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sup>②</sup>,另一本是洛乔易(Arthur O. Lovejoy)的《存在之链》<sup>③</sup>。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日常所使用的“概

\* 孙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

①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②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念”,其内涵近于“观念”,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冠名“观念史”、“关键词”的研究,其内容与概念史的取向并不相悖。其实,细究起来,在欧洲语境里,概念史和观念史在研究方法上径庭有别,在概念史的提倡者看来,无论“关键词”还是“观念史”,都没有如概念史研究一样区分语词的内涵和运用,因而在其研究中看不到“历史”<sup>①</sup>。

## 一、概念

19世纪中叶汉译西书曾对日本学习西方影响甚深,不到半个世纪,源自西方的各种新知识借助“和制汉语”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众多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时人在生吞活剥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时,发明了各种速成学习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1899年编写的《和文汉读法》一书<sup>②</sup>。借助这一独特的学习方法,梁启超及该书的读者们得以广泛涉猎日语西学书籍。不过,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和文汉读法》其实问题不少。如关于“概念”一词的释义,不知出自梁启超还是哪位传抄者,释文者竟望文生义地旁注道:“大概想念。”<sup>③</sup>这一似是而非的翻译完全忽略了“概念”在逻辑学中的含义,也忽略了“概念”被生产的语词的历史。

概念/concept一词源于拉丁语 concept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把握、萌芽、构思及受孕、胎儿等。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沉思录》一书中使用过概念一词,但是,意欲以“直觉”和“演绎”来证明物质世界的笛卡儿对“观念”和“概念”并没有加以严格区分<sup>④</sup>。一般而言,对概念最早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认为概念(conceptus)是表述(representatio)的产物,表述有感觉与认识之别,认识有直观和概念之分,概念则有经验概念和纯粹概念之异,纯粹概念又有悟性概念和理性概念(理念)之差。后世有关概念的讨论都是围绕康德的言说展开的<sup>⑤</sup>。

①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4. 汉译本参见《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斯金纳批评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没有“历史”(genuine histories)。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I: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xi.

② 陈力卫:《梁启超の「和文漢讀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沈国威编:《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8年。

③ 梁启超:《和文汉读法》,京都大学藏梦花芦氏本,第64页。“观念”则解释为“观而想念”,第90页。

④ René Descartes, *Méditations de Prima Philosophia (Œuvres de Descartes:7)*, Paris: J. Vrin, 1996.

⑤ 关于康德“概念”的讨论,参见近藤和敬:《概念について》,《現代思想》2012年1月号。

当 concept 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时,19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及其后继字典都将 concept 译为“稿”,在解释 conception 的含义时,将其与 notion 并称为“意”、“意见”<sup>①</sup>。

第一个以汉字“概念”(がいねん)来翻译 concept 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学者西周,西周受过严格的汉文训练,又有留学荷兰的“兰学”背景,他准确地捕捉到了当时欧洲关于概念的界说。他认为,概念是指从各个事物中抽取共同特点而建构的表象,具有内涵(意味内容)和外延(适用范围)两个方面,由被称为“名辞”的词语来表示<sup>②</sup>。1869 年,西周在《学原稿本》一文中阐述了逻辑学原理——他称之为“学原”或“致知学”。他举例说,人们之所以未见而能知,可以在横滨讲述长崎的狗,在长崎讲述横滨的乌鸦,乃是因为心中已经有了狗和乌鸦的形象,借助这一形象得以知之。这个“知”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但还只是“直知”,只有不断累积“直知”,才能最后形成“念”<sup>③</sup>。“念”有概念(notion)和想念(idea)两个层面,“概念”是“归纳之思”,“想念”为“推演之思”<sup>④</sup>。1871 年,西周在《五原新范》一文“念区概括”一节中进而阐发道:概念是在了解事物的表征之后形成的,它不能完全究明事物的外形和本质;“想念”是想像力的产物,是通过直觉和直知将事物的外形和内容呈现于心中<sup>⑤</sup>。西周以“概念”一词翻译 notion,以“想念”一词对译 idea,涵盖概念和想念的“念”对译什么呢?西周在“念区概括”一节旁注中注明“conception”、“begriffe”(begriff——引者)。1875 年,在《致知启蒙》一文中,西周在重复上述关于狗和乌鸦的比喻后,在“念”后附注“conception”,而在关于事物“外形内质”的认识中,概念属于“度量观”(quantity),观念属于“形质观”(quality)<sup>⑥</sup>。

在翻译“conception”一词时,西周有些踌躇,还同时发明了“理会”一词,可能觉得不如“念”,最后弃之未用。concept 涵盖 notion,西周把 concept 和德语 begriff 并列翻译为“念”,可谓用心良苦。方维规教授指出,begriff 自动词为 begreifen,在德语

①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1823.

② 石塚正英、柴田隆行编:《哲学·思想翻訳語事典》,东京:论创社,2003 年,第 34 页。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汉语辞典》,东京:明治书院,2007 年,第 88 页。

③ 西周:《学原稿本》,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 1 卷,东京:宗高书房,1981 年,第 314—316 页。

④ 同上,第 317 页。

⑤ 西周:《五原新范》,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 1 卷,第 355—358 页。

⑥ 西周:《致知启蒙》,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 1 卷,第 397—398 页。



中的意思是对不容易看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sup>①</sup>。西周的“概念”和西周之后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后来流行至今的“概念”相当于西周的“念”,包含了西周所讲的“想念”即“观念”的意思。1878年,美国人费诺罗沙(Ernest F. Fenollosa)受邀到东京大学讲授哲学,他在《政治学讲义》第三讲中称:“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概念。”<sup>②</sup>1881年,毕业于哲学科的井上哲次郎编纂的《哲学字汇》中收录了这一翻译<sup>③</sup>。1887年,今井恒郎在译著《哲学阶梯》中称:“观念由觉性而得,概念由悟性而得。”<sup>④</sup>

虽然“概念”作为哲学用语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在日语中扎根,但还不能说“概念”已经具有社会政治含义而被广泛使用。1874—1875年出版的著名学术刊物《明六杂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概念”,涉及思想、政治和文学的综合杂志《国民之友》在1888年一年内只出现过2次,1894年的《女学杂志》中出现过1次,著名的综合性杂志《太阳》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28次(1895年)、11次(1901年)。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成为在社会上流通并被赋予一定时代内涵的“概念”了。

《和文汉读法》将概念解释为“大概想念”,只是清末知识人学习日语时的一段小插曲。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在“释名”一节谈名学即逻辑学时称:“若干个物公性之总合,谓之概念。结合二个之概念,指定其间之关系者,谓之判定。指定两个以上之判定间之关系者,谓之推理。”<sup>⑤</sup>概念出自“公性总合”,那么,“公性总合”又是什么呢?在“释教育”一节中,编者写道:“为心意之产物的表象,谓之观念,从个物抽出其共同之点,而生起共同观念者,谓之概念。”<sup>⑥</sup>原来,“公性总合”就是“共同观念”,就是“概念”。《新尔雅》虽然准确地传递了当时流行的逻辑学意义上概念的意思,但是,汉语概念具有与日语概念相同的问题,即“观念”和“概

① 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

② 参见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编:《学問と知識人》,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第357页。

③ 井上哲次郎编:《哲学字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881年。

④ ウェンツケ:《哲学階梯》,今井恒郎译,东京:春阳堂,1887年。原著: von J. A. Wentzke, *Compendium der Psychologie und Logik: für die Gymnasien und Realschulen erster Ordnung*, Leipzig: B. G. Teubner, 1868。

⑤ 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年,第75页。

⑥ 同上,第54页。

念”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在日语和汉语中,大概两个名词都侧重在“念”——一个佛教语汇——上,故而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的陈文《名学教科书》,对于名学——逻辑学(logic)知识解释如下:“名学者,研究思惟之律令之科学也。”而思维(thought)则是“以同时现于心中之二观念联结而发明其相属与不相属之心作用也”。接着又写道,观念“由官体之感觉收为认识之形式,而为意识之主宰者也”。“人类一切知识,皆由观念始。未见汽船、汽车者,必不知汽船、汽车之为何状,未习英语、德语者必不知英语、德语之为何声也。”而概念是“悬比多数观念之性而综合之也。如由梅、桃、樱等诸花悬比其通有之性,以构成非梅、非桃、非樱之一新观念,曰花。此新观念即为概念”<sup>①</sup>。即:概念是观念的综合和抽象。

从以上“概念”一词在汉语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可知,翻译不只是词语对译,还涉及到意义和修辞等问题。翻译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对不同语言和概念“同一性”之认识,不同语言和概念之间具有可通约性。但是,从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关于翻译的“不可能性”和分析哲学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可知,“概念”一词未必能准确传达 concept 一词的意思,更何况如本文开头所述,在实际使用时还衍生出各种歧异。于是,当一个多世纪后人们重新审视包括“概念”在内的近代诸概念生产、再生产的历史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便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 二、概念史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词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个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里希特(Melvin Richter)在比较《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sup>②</sup>、《哲学历史词典》<sup>③</sup>、《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年》<sup>④</sup>这三部风格各异的多卷本巨著时,将“概念史”视为涵盖三者概念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术语”(a

① 陈文:《名学教科书》,上海:科学会编译部,1911年,第1—4页。

②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

③ 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 Ritter, (et al.),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Schwabe, 1971—2007.

④ Rolf Reichardt, (et al.),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Oldenbourg, 1993.

generic term)<sup>①</sup>。方维规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认为,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是同义词,“历史语义学”关乎语词和语句,同时并不排斥“历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等相类)<sup>②</sup>。在《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一文中,方维规简要介绍了德国的“概念史”亦即“历史语义学”模式、英美“观念史”模式、法国的“话语分析”或“概念社会史”模式,强调历史沉淀于概念之中,概念史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来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sup>③</sup>。

与德国概念史不同的是以波考克(J. G. A. Pocock)的“话语”(discourses)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意识形态”(ideologies)研究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斯金纳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为非历史的、神话研究,主张为了再现主体的意图,应该关注构成文本的语言习惯和作者/主体的信念,将思想史上的各种话语置于政治事件中来考察<sup>④</sup>。对于“概念史”,斯金纳承袭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概念即工具”(concepts are tools)观点,强调要理解概念必须先理解与其相关的事物,因而不存在所谓概念的历史,而只有如何使用概念的争论的历史<sup>⑤</sup>。尽管如此,里希特还是试图在德国概念史和剑桥学派之间牵线搭桥,他强调,剑桥学派和德国概念史关系密切,概念史方法可以应对英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变”,同样为思想导入了历史内涵。

笔者关注概念史方法是与对自身所从事的社会史研究的反省相关联的。在笔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2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过度强调界域划分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社会史原本具有的“反命题”(antithese)特质黯然不显<sup>⑥</sup>。当学者的研究“对象”——文本(text)与产生文本的语境(context)

①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4.

② 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9页。

③ 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第3—20页。

④ James Tully,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在这本书中,斯金纳的批评者讥讽他的研究反对以往的思想史“神话”,却创造了“碎片化的神话”。

⑤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133.

⑥ 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相互关联后,文本生成背后的情境成为社会史的关注所在,文本自身的语言和构成成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

其实,回顾法国“新史学”的历史,在其发轫之初就有人注意到词语的重要性。1930年刊行的《年鉴》(*Annales*)杂志曾把“物与词”(things and words)作为其副题。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说:人在改变风俗习惯的时候,没有改变语汇的习惯,这一事实常常使历史学者犯下错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新词,而这个词实际上很早就存在了<sup>①</sup>。针对学界在“观念史”、“关键词”、“新名词”和“概念史”等使用上缺乏统一,笔者曾撰文做过辨析<sup>②</sup>。根据科塞雷克的提示,可以将德国概念史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1)概念史与语词史。单个语词都有明确意义,而概念未必有明确的意义。概念是通过词语表现出来的,但比词语拥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述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旨在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简单循环,从而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发出一定的紧张关系<sup>③</sup>。(2)概念史与观念史。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的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是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关注社会的、政治性的词语,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sup>④</sup>。(3)概念史与社会史。社会史研究以文本为手段,试图揭示文本中没有包含的东西,而概念史主要对文本和词语感兴趣。比如,社会史在研究社会团体、阶层、阶级之间关系的时候,往往超越具体的语境,揭示中期或长期的结构及其变化;而概念史本来源于哲学用语史、历史语言学和语义学等领域,是在对文本加以解释的基础上出现的研究领域。如此看来,所谓概念史就是关于词语的社会、政治史或曰社会、政治的词语史<sup>⑤</sup>。

①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 Colin, 1993. 汉译本《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孙江:《文本的终结与近代知识的发生:概念史的视角》,“国民国家的近代性及其文化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成钧馆大学东亚学术院,2006年7月5—7日。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③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④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2.

⑤ 《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刊登了李宏图等四位学者关于“概念史”的笔谈,可知近期国内学者对概念史的理解。

在德国执教的小林敏明在关于日本现代思想研究的《主体的走向》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即在汉语哲学词汇里类似于主体/客体、主观性/客观性等带“体”和“性”等涉及身体语言的翻译甚多,比如“主体”是对 *subjekt* (*subject*) 的翻译,但西周的这个翻译却是远离本来意思的“能指”(signifiant) 游戏<sup>①</sup>。追根溯源,造成这种误译的源头在 *subjekt* 由以产生的西欧思想语境之中。小林的提醒,让我想起一句老生常谈:翻译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有同一语言内的翻译,而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翻译则兼而有之。

### 三、中国语境

伯克(P.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一书中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化或实用知识,当这些知识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机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s*)而合法化”<sup>②</sup>。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生产及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之不同。那么,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呢?

裔出德国的概念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20世纪80年代末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的误读和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真的是“中国中心化”的中国吗?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所著《势:中国效力的历史》一书堪称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的中国版,书中力证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中西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中国思想缺乏现代/后现代要素,于连从政治、文字和历史等角度研究“势”(运动性)概念后指出,以主体和因果关系为中心的欧洲思想发展到现代才开始强调差异性和动态,而这些都是都可以从中国思想中找到源头活水<sup>③</sup>。毋庸说,用西方二元对立概念叙述的中国思

① 小林敏明:《〈主体〉のゆくえ——日本近代思想史への一視角》,东京:讲谈社,2010年,第11页。

②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 14-15.

③ François Jullien, *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cité en Chine*, Paris: Seuil, 1992。参见中岛隆博日译本《势:効力の歴史——中国文化横断》,东京:知泉书馆,2004年。于连在本书和其他著作中的观点,成为欧洲主流汉学界批评的对象,参见王论跃:《法语儒学研究中的相异性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3日。但是,笔者认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于连的思路值得肯定。

想,不是“本真”的中国思想。与于连的运思不同,张寿安对围绕“乾嘉之学”的各种话语——汉学、考据学、朴学、实学等提出异议,经过对“乾嘉之学”条分缕析后,她认为18世纪出现的“专门之学”表明传统学术内部业已萌生出现代学术之“分科”,及至晚清,“经训之学”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崔适假江藩之名所撰《经解入门》一书将“经解”视为一种专门之学,从方法、资料到理论、目的都有清楚的界定<sup>①</sup>。于连和张寿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与西方现代知识相对应的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能性,无疑,这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具有跨文化特质,这是德国概念史未曾尝试过的。撇开围绕现代性认知之不同,在讨论16世纪末以降中国内部的变化时,人们无法回避与西方遭遇的历史,正是这一遭遇及其一系列连锁反应铸就了被称为“近代”的知识空间。各种西方语言文本被翻译为汉字文本,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翻译文化”<sup>②</sup>,或“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sup>③</sup>的时代,并且中日之间还经历了以汉字为媒介的“概念旅行”。近年,学者们已经围绕一些重要概念展开了研究,有关“近代社会-国家”的概念,有革命、宪政、地方自治、民主、自由、共和、社会,等等,如上述小林关于“主体”概念的论述,概念史研究在词语上涉及同一语言内的翻译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如“大学”一词,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似乎最早使用<sup>④</sup>,这位“西方孔子”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讲授过人文科学,巧得很,博洛尼亚是欧洲大学的诞生地,而当时所谓大学不过教授神学、哲学、数学和修辞等,博洛尼亚大学外加罗马法,内容十分有限。艾儒略选择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大学”来翻译 universitas,无疑有其考虑,这里暂且不论。拉丁语 universitas 原本是互助之意,后来演变为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在欧洲,“大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被翻译为汉语的“大学”最后真正能够对应近代西欧语言则是很晚的事情,其中来自日本的因素不可忽视。诚如与“大学”相关的词语还有“书院”、“大学堂”、“学堂”、“学校”等,中国的

① 张寿安:《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黄东兰主编:《新史学——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②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译と日本の近代》,东京:岩波书店,2012年。此书系二人关于翻译的对话。

③ 刘禾:《跨语际实践——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④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概念史研究不仅要对各个重要词语的历史进行深描,还要注意概念词源的复数性,有必要对构成概念的词语群加以研究。极力反对将哲学用于诠释中国思想的傅斯年曾经说过:“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似同而异。”<sup>①</sup>信哉,斯言!

一如概念史研究关心文本一样,要追究词语如何演变为概念,有必要对涉及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清末出现的翻译文本如《圣经》、《万国公法》、《国富论》、《天演论》等,创作文本如《孔子改制考》、《馗书》等,以往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上述“大学”概念相关,研究近代知识规训和普及离不开教科书。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先后发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后者对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奏定中学堂章程》:“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sup>②</sup>清政府还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sup>③</sup>。教科书文本的编纂方针、语言修辞和内容体现了权力的意志。关于教科书研究,如斯金纳一样,不仅要考察文本中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有何种叙述性意义(meaning),更重要的还要挖掘作者语言和议论背后的写作意图。

与概念和文本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制度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制度化”。知识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借助语言来接受知识。需要附加说明的是,从概念形成的角度看,知识确实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但制度并非先验的,而是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批评结构决定论时所说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制度化”——捕捉过去、开启未来的“事件”<sup>④</sup>。近代知识是在能动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就上述“大学”概念而言,与此相关的制度包括学校、分科、教科书制作等知识/权力装置。清末蒋维乔等编撰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八册)出版后,广受欢迎。关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宗旨,商务印书馆的推介广告词写道:“是

①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②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③ 《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同上书,第500页。

④ 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dans l'histoire personnelle et publique; Le problème de la passivité; le sommeil, l'inconscient, la mémoire; notes d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54-1955)*, Paris: Belin, 2003.

书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其表章国粹，矫正陋俗，亦三致意焉。”<sup>①</sup>在黄龙旗易为青天白日旗、历史迈入共和时代后，蒋维乔等将上述教科书略作修订，更名为《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详解》（八册）继续刊行，该书广告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sup>②</sup>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因为，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

① 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封底二。

② 傅运森：《新历史》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封二。



## 序：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

□ 孙 江\*

如果打开汉语因特网,输入“概念”二字进行检索,一定会蹦出数以万计的关于“概念”的信息。“概念”一词如此普及,乃至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其在逻辑学中的含义,都以为对概念有了“概念”(理解)。如果继之输入“概念史”一词进行检索,则会发现“概念史”是近几年才比较多地被使用的词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著述之中:一类为《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所提倡的概念史,它强调德国概念史方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另一类是在翻译和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时,人们注意到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与德国的概念史方法相似。值得思考的是,与概念史一词相比,广为学者所使用的是“观念史”或“关键词”<sup>①</sup>,这可能与两本影响广泛的著作有关,一本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sup>②</sup>,另一本是洛乔易(Arthur O. Lovejoy)的《存在之链》<sup>③</sup>。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日常所使用的“概

\* 孙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

①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②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